

第一次冷战

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

[美] 唐纳德·E. 戴维斯 著
尤金·P. 特兰尼
徐以骅 等 译

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一次冷战

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

〔美〕唐纳德·E.戴维斯 著
尤金·P. 特兰尼
徐以骅 等 译

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579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美)唐纳德·
E. 戴维斯等著;徐以骅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
ISBN 978-7-301-12749-0

I. 第… II. ①唐… ②徐… III. 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5720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

著作责任者: [美]唐纳德·E. 戴维斯 尤金·P. 特兰尼 著

徐以骅 等译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749-0/D·18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32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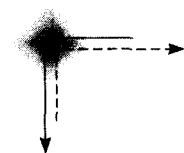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译 序

《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纳德·E. 戴维斯 (Donald E. Davis) 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教授/校长尤金·P. 特兰尼 (Eugene P. Trani) 关于美国威尔逊政府时期对俄政策研究的一部力作。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生院的同窗，戴维斯是俄国研究资深专家，而特兰尼则是美国历史的权威学者，两人此前已有若干合作，因此由这两位学者携手合著此书，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本书对威尔逊总统任内（从威尔逊 1913 年 3 月就任总统到 1919 年 12 月美国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军）美国对俄政策的演变作了极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其涵盖的主要内容有威尔逊上任之初美国与俄国打交道时的孤陋寡闻和缺乏准备、美国使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继续参战的种种努力、威尔逊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举棋不定及美国针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秘密和公开的政策与活动、美国对北俄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军事干涉，以及美国在俄国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本书还对当时在彼得格勒与国务院常唱反调、其遭遇和命运颇类后来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 (John S. Service)、戴维斯 (John Davis) 和包瑞德 (David D. Barrett) 等美国军事使团成员和红十字会官员贾德森 (William V. Judson)、汤普森

(William Boyce Thompson) 及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 等人鲜为人知的活动,作了十分引人入胜的描述。就文献资料而言,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上百种美俄有关原始档案以及大量文献资料。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本书的“骨架”就是国际政治家和外交家之间关于俄国局势的那些难以计数的往来函电[*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 3, 2002)]。本书还附有“关于注释与史料”一文,该附录其实是一篇极为详尽的史学综述和研究指南,对任何有志于研究威尔逊政府时期美国对俄政策和冷战史的学者和研究生而言,均不失为一篇非常值得一读的参考文献。

戴维斯和特兰尼教授在本书中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分析论证,得出了若干颇为新颖的结论。他们得出的第一个主要结论,就是冷战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相反,作者在书中指出,指引美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最初是在威尔逊政府期间形成的,是“威尔逊政府发动了从1917至1933年的‘冷战’”。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作者进一步明确指出:“被认为开始于1945年的所谓冷战现象,其实起始于1920年。我们将其称之为第一次冷战。”作者还争辩说,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就是为从1946至1991年的冷战开辟了先河,因此“有可能从威尔逊及其合作者到凯南和里根之间划出一条较直的线,威尔逊分子是最早的冷战斗士,并且第一次冷战就在威尔逊时代开始”。作者对前后“两次冷战”进行比较后还得出以下结论:“威尔逊、蓝辛和科尔比帮助奠定了后来冷战和遏制政策的基础。虽然这里没有军事对抗、武装对峙和军备竞赛,但一些基本要素已经存在:猜疑、互相误解、反感、畏惧、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外交孤立。”诚如作者所言,把冷战的根源追溯到威尔逊政府任内的观点,首先是由美国新左派史学的开山鼻祖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提出的。但把冷战的跨度前推1/4个世纪,通过极为详尽的、包括最新开放的有关档案资料来加以论证,并且系统提出“第一次冷战”的史学观点,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家之言以及对冷战起源这一史学热门课题的重要贡献。

第二,戴维斯和特兰尼教授在本书中提出了“失去机会说”,即作者认为威尔逊政府本来可以并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来改变美俄关系进程,但威尔逊却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在对俄关系上宁可少一事不愿多一事,尤其“不愿做任何事来使世界摆脱共产主义”,结果始终未能制定一项有效的政策。因此在临时政府期间虽然“威尔逊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不断恶化的局势”,但威尔逊并未对俄提供大规模无条件援助,而仅仅把美援局限于“鲁特使团、青年会干事、少数铁路专家,一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小规模宣传活动,以及一些贷款”,于是威尔逊错失了挽救“新的俄国民主”和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大机会”。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准备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以退出战争时,作者坚持认为威尔逊政府错失了另一个巨大机会。因为通过采取“罗宾斯-贾德森计划”即许诺提供美援和外交承认,美国本可防止苏维埃政府在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和约,从而减轻德军对西线的压力,但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和威尔逊却对该计划“关上了大门”。最后在巴黎和会期间及其后,作者认为如美国政府和协约国接受布利特使团的“和平建议清单”,并且不任由得到法国支持的白卫军政权破坏王子岛计划的话,那么“布利特就已解决了布尔什维克难题”,因此西方国家似乎又错失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一次巨大机会。

第三,作者把威尔逊对俄政策的重重矛盾归结为所谓威尔逊的策略反对威尔逊的理想:一方面威尔逊恪守他所谓的民族自觉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反对干涉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屈从于实用政治,参与有限干涉并选择了与20世纪50年代遏制政策十分近似的外交隔离(没有牙齿的遏制)政策。虽然作者在此也许只是重复或深化前人的观点,但作者以此来解释威尔逊在对俄和解姿态和敌对行动之间摇摆不定以及作为“第一次冷战”标志的隔离政策的出台,还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

《第一次冷战:伍德罗·威尔逊对美苏关系的遗产》2002年由密苏里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美俄史学界的关注,不久便有俄文版的问世,被“视为对有阅读能力的俄国公众所不能不对之发生兴趣的课题的一项非常严肃的研究”。有关书评也络

绎不绝,有的书评称该书“应被所有对冷战起源有兴趣的读者所考虑”[*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vol. 179, no. 1 (Jan. 15, 2003)]。但由于本书涉及历史重大问题,又提出若干颇有争议的观点,因此各种书评褒贬不一,有不少批评和商榷的意见。

对本书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些学者认为,“第一次冷战”或“二次冷战”之说的最大问题,就是此两个阶段或“二次冷战”缺乏可比性。美国圣约翰大学的著名俄国史教授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在其关于本书的书评中指出,虽然持续的意识形态对立贯穿于“二次冷战”,但在一次大战后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某种地缘政治上的威胁,而在二次大战后“苏联却是一个兼具敌对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威胁的超级大国”,因此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苏关系较为友善,这对1945年后两国的紧张关系也不会有何影响[*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Sept. 2003)]。在权威的《美国历史杂志》撰写书评的费尔菲尔德大学教授戴维·W. 麦克法登(David W. McFadden)批评“第一次冷战说”过于牵强附会且自相矛盾,比如两位作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第一次冷战”是威尔逊及其主要顾问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迅即指出“除了无所为——观望和等待以期列宁的政府被推翻之外,美国政府无任何政策可言”。又如作者既然认为威尔逊在1920年发动了冷战,那就便需以此来解释1920至1945年的美苏关系。作者把“第一次冷战”的下限定在1933年,把从1933至1945年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政策视为对“冷战”的背离,而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对俄政策则被看成是从“科尔比照会”扩展为更为强硬敌对的“科尔比—胡佛—休斯主义”,对在此期间美苏贸易迅速增长及苏俄重回国际舞台等许多重大事件视而不见[*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0, no. 3(December 2003)]。亚历山大·瑙莫夫(Alexander Naumov)认为“第一次冷战说”未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和二次大战后国际关系的差异。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的凡尔赛国际关系体系是多极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则是两极的。因此前后“两次冷战”目的全然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初威尔逊只是谋求孤立布尔什维克俄国;而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杜鲁门

(Harry S. Truman) 总统则与苏联在全球范围争霸[*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Nov. 7, 2003)]。

对于这些批评,特兰尼教授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反驳说,那种认为不可对两个在地缘政治上不同的时代进行比较的看法是肤浅的,“如果我们因这两个时代被认为在结构上不同而停止并拒绝考虑对之进行比较,那我们就会因把冷战视为完全孤立和独特的当代现象这种短视的看法,而对那些通常被掩盖的长期趋势视而不见”。平心而论,作为对传统史学观念的挑战,本书的“第一次冷战说”虽尚未铸成关于冷战最初起源的“铁案”,像有些书评所说的那样[见 *Commonwealth Review* (Nov. 6, 2002)],但此种对冷战起源非传统的解释以及比较研究的视角均无可厚非且言之有据,美苏以及西方和苏联之关系在二次大战前后确实有着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更多的连续性。只是在这里特兰尼教授所反驳的主要应是弗兰克·宁科维奇,而非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Vyacheslav Nikonov)。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外孙、为本书俄文版作序的尼科诺夫博士尽管认为人们甚至“还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觉察到‘冷战’的种种迹象”,却并不特别反对“第一次冷战”的提法,将其作为主要反驳对象显然是欠妥的。

其次,本书的“失去机会说”也引起较大争议。《美国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战争:1917至1920年美国对俄国内战的干涉》(*America's Secret War Against Bolshevism: U. S.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1917—1920*)一书的作者戴维·S.福格尔桑(David S. Fogleson)批评说,本书关于威尔逊政府“失去拯救俄国新民主的机会”的说法言过其实,实际上1917年摇摇欲坠的临时政府并不那么“民主”,而美国“失去俄国”说更无从谈起[*Register of the Kentucky Historical Society* (2002), pp. 543—544]。事实上连本书的作者也承认,一国之命运“由另一国家来加以改变实属不可能之事”。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劳埃德·E.安布罗修斯(Lloyd E. Ambrosius)在其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的书评中批评说,本书作者并未正面回答威尔逊能否做什么事来维持临时政府以及防止十月革命的发生这样重大的问题。由于只是狭隘地关注美国的决策过程,作者忽视和回避了革命的俄国完全不受美国和协约国

控制的更广泛的问题。因此作者关于威尔逊要对“失去机会”负责的结论是建立在存在其他可供选择的“未经论证的假设”之上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8, no. 3 (June 2003)]。尼科诺夫也指出,“考虑到俄国政治传统的惰性、具体的局势和1917年时全国政治势力的平衡”,他并不认为“当时就总体而言,俄国存在着民主化的机会”。加之美国当时仍无与俄国交往的经验,而且当时世界正遭遇到一个崭新现象——共产主义。因此威尔逊总统不该受“失去指引俄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机会”这种批评。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或所谓第一次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俄国的“民主化”则不仅是威尔逊、而且恐怕也是本书作者的一厢情愿。不过也有批评者如马休·方丹(Matthew Fontaine)这样解读说,尽管许多人认为威尔逊政府“浪费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变得巩固之前将其消灭的机会,但本书的两位作者却令人信服地指出,威尔逊制定了在上世纪余下的时间内在美国外交圈内一直颇受拥护的谨慎的隔离政策”[见前引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 3, 2002)]。这样一来,本来被认为批评威尔逊坐失良机的本书作者似乎在为威尔逊涂脂抹粉、评功摆好了。

再次,“重美(国)轻俄(国)”是对本书的另一主要批评。比如阿克伦大学的迈克尔·杰巴拉·卡利(Michael Jabara Carley)批评在本书中“苏联方面的故事付之阙如”,因此《第一次冷战》并非“一本关于苏美关系的著作,而只是另一篇美国政府对苏俄政策的报道。我们得知美国方面的想法,但对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想法却知之甚少。列宁、托洛茨基、契切林、李维诺夫在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中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安布罗修斯在以上引文中亦认为,本书作者主要关注的不是在俄国所发生的事,而是美国政府在1917至1920年间如何谋求一项对付革命俄国的政策;他们所试图解释的不是“俄国问题”本身,而是关于“俄国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机会说”便是因作者忽视俄国革命和内战的社会根源所至。就此而言,“失去机会说”颇类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朝野关于“失去中国”的外交政策辩论,都或多或少地出于美国某种“天下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

不过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史学对美国政府在十月革命前后对

俄干涉似已不像从前那样尽力遮掩讳莫如深,新正统派史学甚嚣尘上,如有学者就鼓吹“干涉有理”,声称当时美国如尽全力扼杀布尔什维克革命于摇篮之中[可见 Ilya Somin, *Still-Born Crusade: The Tragic Failure of Western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1918—1920*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 Harper Barnes, *Sanding on a Volcano: The Life and Times of David Rowland Francis* (St. Louis, Mo.: 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Francis Press, 2001) 等]。相形之下,本书“失去机会说”所表达的就并非那种显而易见的“得胜后的趾高气扬”。针对本书“重美轻俄”的批评也相当切中要害。但诚如尼科诺夫在本书《俄文版序》中所言:“近年来为求自我了解,我们对自身的历史做了许多思考,以便得到事件和现象的真相。因此难以想象俄国读者不熟悉 1917 年革命,以及西方干涉和内战的历史。然而,我们的视角是由里向外的。而特兰尼和戴维斯则提供了从外向里的最广阔的视角。”另一位俄国学者阿纳托利·米诺什涅克(Anatoly Miroshnik)亦指出,对俄国革命和内战这些问题“俄国史学家已作深入研究,但外人的看法总是令人感兴趣的”[Smena (July 21, 2003)]。对同样也较为熟悉俄国十月革命史的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本书的“重美轻俄”的所谓缺陷反倒更能成全我们“内外结合”了解历史全貌的愿望。鉴于目前俄国有关历史档案开放的有限程度,我们对本书作者侧重美国对俄政策的研究进路,似也不应苛求。

特兰尼教授在本书的《中文版序》中提到,目前本书的两位作者正在撰写另一部关于美国对俄关系史的著作,并且将之与美国对华政策史进行比较。据本人所知,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目前已数易其稿,最初取名为《观念与政策:20 世纪的美俄、美中关系》(*Perception and Policy: America's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现似已定名为《熊与龙的故事:20 世纪美国与俄国和中国爱恨交织的关系》(*Romancing the Bear and Dragon: The Story of America's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从所拟的书名和已完成的章节来看,两位作者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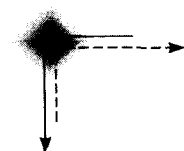
在这部新书中更强调社会文化分析,并且更多利用中俄有关档案文献。在撰写这部新书时,作者还特邀中俄资深学者各一位参与研究,本人的同事、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光耀教授,便应邀担任有关章节的主笔。我们将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这部计划在美、中、俄三地同时出版的著作。

本书作者之一特兰尼教授为家父老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多次访华。1984年本人作为研究生在刘绪贻先生门下研读美国史时,曾在武汉大学聆听过特兰尼教授关于美国史的精彩演讲。不久前我们还将其早年的学术论文《伍德罗·威尔逊、中国与传教士(1913—1921)》[Woodrow Wilso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ies (1913—1921)]译成中文[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三辑)]。此次受特兰尼教授委托翻译本书,本人深感荣幸;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时得到作者的指点和提供的资料,对此本人深表感谢。

参与本书翻译的有复旦大学国政系和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马建标、秦倩、涂怡超、陈茂华和硕士研究生李毅。其中马建标翻译了前言、导言和第一、四、五章;秦倩翻译了第二、三章;涂怡超翻译了第六章;李毅翻译了第七、八章;陈茂华翻译了本书附录《关于注释与史料》。我本人翻译了其余部分,对某些章节和注释作了补译,并通校了全部译稿。本校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的徐海燕博士帮助校译了本书所附地图,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加之不谙俄史俄文,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以骅

2006年7月于上海复旦大学



中文版序

本书为最初由外交史学者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提出的、即冷战的根源比冷战的史学研究者所愿承认的更深,要一直追溯到威尔逊政府任内的观点,作了平反。冷战既是苏联的过错、也是美国的过错。冷战植根于伍德罗·威尔逊对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处理。冷战中有若干中心人物。他们是伍德罗·威尔逊、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列宁。当威尔逊在科尔比照会中做出不承认和限制贸易的最后决定时,列宁已通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雷蒙德·罗宾斯和威廉·C. 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这样的美国渠道,探求了所有和解的可能性。其结果便是长达13年之久的关系的冻结,而这种冻结状态由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而达到顶峰。

富兰克林·D. 罗斯福1933年对苏联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导致了相互承认,这种承认因债务和财产赔偿问题悬而未决而困难重重。虽然在30年代美苏之间充满不信任和误解,但双方关系大门之开放足以让总统特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前往苏联,并于1941年秋在纳粹推进的关键时刻与苏联达成租借协议。这便导致西方和东方之间共同击败纳粹主义的战时联盟。当胜利在望之际,这一联盟进一步得到调整,并从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开始出现战后合作的种种可能性。但这些前景均随

罗斯福的去世和哈里·S. 杜鲁门总统采纳乔治·F. 凯南 (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政策而烟消云散。

本书探讨在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美苏关系最初是如何变坏的。美国人对俄国否定的看法在此前就已存在。沙皇对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反犹主义还助长了这些看法。美国以限制性的贸易政策来加以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对俄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并且随美国于1917年参战,美国使俄国成为盟国。1917年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美国对俄国军事实力的乐观看法也随之破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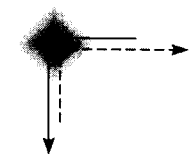
我们以西方和俄国的档案为基础,追溯了新的共产主义秩序和西方之间的曲折的对抗,尤其是威尔逊与列宁的交锋。协约国做出努力来恢复东部战线并与列宁达成协议,但那些和解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在德国被打败后,协约国的干预仍在继续,并且延伸至西伯利亚。但协约国在西伯利亚冒险失败后,在凡尔赛又有遣布利特使俄这一和解努力。公众舆论破坏了这一努力。此后便无其他选择。威尔逊在1920年著名的科尔比照会中,开始了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对布尔什维克实验采取不承认和限制贸易政策以及敌视态度。我们得出结论,被认为开始于1945年的所谓冷战现象,其实起始于1920年。我们将其称为第一次冷战。

对本书的中文版读者,我们也许可以说,在美国和俄国对本书的评论一般都是肯定的。这些书评称赞了我们的研究、写法和组织结构。主要批评则出自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 (Vyacheslav Nikonov) 在本书俄文版序言中的评论。他认为,本书比较一次大战后与二次大战后这两个在地缘政治上不同的时代,是十分勉强的。这种看法在我们看来颇为肤浅。确实,如果我们因这两个时代被认为在结构上不同而停止并拒绝考虑对之进行比较,那我们就会因把冷战视为完全孤立和独特的当代现象这种短视的看法,而对那些通常被掩盖的长期趋势视而不见。

我们的分析可用这样的方式来加以考虑:无论就公共政策还是就美国人广泛持有的看法而言,美国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就已得

出结论,即用后来广为流行的称呼来说,俄国是一个“邪恶帝国”。这一无论是对沙皇还是对人民委员的俄国的负面看法,除了少数例外,在整个 20 世纪一直为美国人所持有。这些例外分别是威尔逊 1917 年支持俄国临时政府,以及 1933 至 1945 年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承认苏联、向苏联提供租借物资并与之建立战时联盟。这种负面看法得到关于俄国的各种政府是不可信赖和危险的公共舆论,以及不承认、限制贸易和那种要求加强军备并因此导致军备竞赛和第二次冷战的不断增长的担忧的公共政策的推波助澜。

在下一本书中,我们将把这种负面看法追溯到美国旅行家和新闻记者、《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作者老乔治·凯南(the senior George Kennan)。该书为在日俄战争中美国亲日反俄政策作了铺垫。到第二个乔治·凯南、也就是第一个凯南的远房堂弟的时代,美国对俄国的否定态度已被奉为神圣,或者说确实已被凯南化。即使罗斯福扭转这种态度的冒险努力也归于失败。而采纳小凯南的遏制理论来对付被认为是斯大林在东欧所造成的威胁,则轻而易举。我们的第二本书描述和分析了整个 20 世纪美国的对俄关系史,并将其与美国对华政策作了比较,而此种政策是对中国作为大国出现的积极反应,除了 1949 至 1972 年间仅有的一次重大倒退之外。在 21 世纪初,美国为如何与其两大邻国——俄国和中国——打交道而感到左右为难。



英文版序

《第一次冷战》不仅仅是在冷战研究卷帙浩繁的书目中新增的一本“有趣”的书，更对我们理解在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使我们精疲力尽的那场斗争之根源有着重大贡献。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从威尔逊政府（在寻求一项政策的大量摸索后）所采取的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到战后美国政府（在抛弃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较为和解的方式后）采取的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之间，可以划出一条较直的线。简而言之，“冷战”——就根本来说也就是如何看待和对付苏联——的根源要上溯到比它通常被认为所发生年代更早的数十年前。此书对这一中心思想做了十分详尽且令人信服的阐述。

结果如何呢？正是在这点上《第一次冷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此书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怎样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且思考些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去谋求我们的利益的事，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陈述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此书描述了影响决策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思考（或缺乏思考）的因素。到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既是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产物，同样也是植根于两个多世纪历史的美国精神的产物。

就一般的层次而言，本书文献资料极其丰富。注释部分不仅

指出了所引资料的出处,而且通常其本身就是既有趣又有用的说明性点评。这些注释同时也是对数量浩繁而且一直似迷宫般的与俄国革命及其在苏联和国际上所引起的后果有关的文件、记录、信件和学术性(以及不那么学术性)论著的精心研究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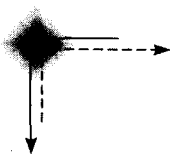
此外,有些令我吃惊的是,密苏里大学出版社能够找到这两位文笔优雅简洁、叙述明白有趣的学者。对他们的使用应有节制以备后用。

劳伦斯·S. 伊格尔伯格
(Lawrence S. Eagleburge)

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2001年7月

伊格尔伯格先生于1957年进入外交界,最初被派驻洪都拉斯,后转至国务院古巴科供职。1961年他被派往贝尔格莱德,1977年作为大使从那里返国。他成为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特别助理,并且先后担任助理国务卿、副国务卿并在1992年出任国务卿。在他所获取的许多奖励中有总统公民奖章、国务院特殊贡献奖,以及由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颁赐的荣誉骑士爵位。目前他担任美国红十字会的国际无任所大使。





俄文版序

为自己师长的著作撰写前言是一项殊荣。而现在我便拥有此种荣誉。

作为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生,我曾聆听尤金·特兰尼教授诠释威尔逊主义的演讲。某种程度上算是本书第三作者的理查德·马金塞(Richard McKinzie)也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任过教,但不久前他却英年早逝。我也熟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唐纳德·戴维斯,但这是通过他的著述而非通过与他个人交往。所有这些严肃和富有才华的学者为此书奉献了20多年的时间。因此,本书应被视为对有阅读能力的俄国公众所不能不对之发生兴趣的课题的一项非常严肃的研究。

近年来为求自我了解,我们对自身的历史做了许多思考,以便得到事件和现象的真相。因此难以想象俄国读者不熟悉1917年革命,以及西方干涉和内战的历史。然而,我们的视角是由里向外的。而特兰尼和戴维斯则提供了从外向里的最广阔的视角。他们细致研究了美国、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档案,重建了在我们革命大动乱时期存在于西方政治家头脑中的令人惊讶的远视图景。于是我们便有独特的机会来窥视那个烹制出与俄国有关政策的厨房,并且了解那种最终导致东西方几乎近一个世纪冲突的驱动力。